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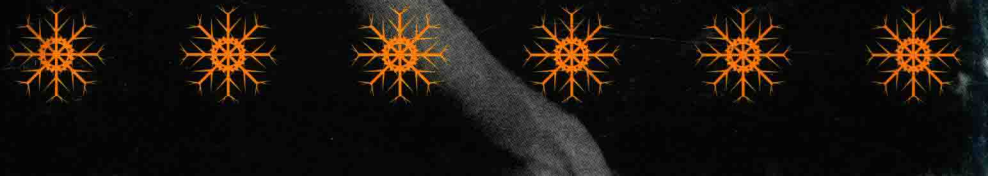


盛宴易散：卡波蒂书信

Too Brief a Treat: The Letters of Truman Capote

上海译文出版社

〔美〕杜鲁门·卡波蒂 著 李祥坤 陈栩 译





盛宴易散：卡波蒂书信

Too Brief a Treat: The Letters of Truman Capote

〔美〕杜鲁门·卡波蒂 著 李祥坤 陈栩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盛宴易散:卡波蒂书信/(美)杜鲁门·卡波蒂
(Truman Capote)著;李祥坤,陈栩译. —上海:上
海译文出版社, 2016. 11

(卡波蒂作品)

ISBN 978-7-5327-7287-2

I. ①盛… II. ①杜… ②李… ③陈… III. ①书信集
—美国—现代 IV.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26059 号

Truman Capote

Too Brief a Treat: The Letters of Truman Capote

Copyright © 2004 by Gerald Clarke

Truman Capote material copyright © 2004 by the Truman Capote Literary Trust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6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09-741 号

盛宴易散:卡波蒂书信

[美]杜鲁门·卡波蒂 著 李祥坤 陈栩 译

责任编辑/管舒宁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cwen.co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9.25 插页 5 字数 289,000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册

ISBN 978-7-5327-7287-2/I·4437

定价: 80.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享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33-8510898

引言

杜鲁门·卡波蒂给自己的朋友写信时，就像跟他们交谈一样，毫无拘束和禁忌，也没有客套华丽的言辞。塞缪尔·约翰逊曾经抱怨说，由于发表书信成了一种时尚，“我在信里就尽量少地袒露自己”。这种谨小慎微之举不是卡波蒂的风格。他恰好相反：在信里尽情地袒露自己，不管是痛苦还是欢乐，失败还是成功。他显然从未想过自己的书信有朝一日可能会发表。年仅二十一岁时，在一封八卦信的信头，卡波蒂曾经草草写道：“阅后销毁!!!”不过，从随后那句弱弱的说明——“在给芭芭拉看后”——我们不难看出他对该指令并没有怎么当真。

杜鲁门·卡波蒂原名杜鲁门·珀森斯，在父母离异、被养父乔·卡波蒂收养后，才改为现名。本书中的第一封信是一九三六年秋写给他的生父阿奇·珀森斯的，当时杜鲁门十一二岁，这封信是他的身份由旧变新的声明。他对珀森斯说，“大家都叫我杜鲁门·卡波蒂，如果您以后也能这样叫我，我将不胜感激”。

随后的许多封信构成了一部某种意义上的自传。既有非常年轻时的卡波蒂，热情豪迈，意气风发，像孩子一般，在二战结束后的几个月里，纵身跃入纽约文坛的滔滔激流，也有五十年代略微内敛的卡波蒂，多数时间与杰克·邓菲——自一九四八年一起居住在欧洲，忙于创作戏剧、电影剧本、小说和新闻写作实验。

接着还有六十年代早期的卡波蒂，全身心地投入到他一生中

为艰巨、最令他心力交瘁的作品的调查和创作之中。该书名为《冷血》，讲述的是堪萨斯乡村一家四口惨遭灭门及杀害他们的凶手佩里·史密斯和迪克·希科克的故事。《冷血》成为六十年代轰动性的出版事件，它将小说技巧与非虚构类作品的纪实报道相结合，从此永远改变了非虚构类流行作品的创作。由于这本书的成功，加上电视的饥渴眼光和他自己张扬的个性，在随后的几年里，卡波蒂成为美国——也可能是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最负盛名的作家。

最后还有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他于一九八四年去世——的卡波蒂，对自己的生活和创作感到灰心，越来越依赖于毒品和酒精，而且毫不掩饰。他的信写得越来越少，大多是明信片 and 电报，本书结尾收录的是置身纽约的卡波蒂给一如既往地瑞士过冬的邓菲所发的电报。电报的全文是：“想念你需要你发电报告诉我何时可以见到你爱你的杜鲁门。”（本书最后附有关于卡波蒂生平的年表。）

从第一封信到最后那封如泣如诉的电报，读者可以领略各种魅力、愉悦和乐趣。卡波蒂并不是在创作“伟大的写信艺术”——这里再次引用约翰逊博士的话。他只是自然而然。凡是署有他名字的所有其他作品，他都会再三修改润色，有时甚至一连花几个小时去搜寻合适的字眼，但写起信来他却速度飞快，并像他有时所说的那样匆匆送到邮局，以赶上最后一次取件。“离邮局关门还有十分钟，”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里说，“所以写得很匆忙。”因此，他的信中有一种那些更为谨慎和刻意的作家书信中往往所缺乏的率性。“你的信如易散的盛宴，”他对一位朋友说，但这何尝不是对他自己所写的书信的描述，它们真的是如易散的盛宴——我将这个选为本书的书名。时至今日，那些信仍然如当年初写时那样意

趣盎然，一封封都生气勃勃跃然纸上，邀请人们一读为快。

卡波蒂喜欢八卦，不管是讲还是听。“再给我写一封有趣的八卦信吧；它会让我觉得我们仿佛在某个地方小酌一般，”他在一封信里这样写道。而在另一封信里，他说：“给我写信吧！并回答上述问题。”在五十年代，卡波蒂主要居住在欧洲，他想念曼哈顿的热闹。他说：“秋天的纽约——哎呀，那是最值得逗留的地方。”他好说歹说，请求人们为他提供趣闻轶事。他问一位朋友：“喂！你为什么不给我不写信啊？”他还对另一位说：“给我写信吧，因为爱你的这位朋友在对你日思夜想。”

为了开心取乐，同时也是为了缠着那些不按时回信的朋友给他写信，他创造了一个名为“国际雏菊链”的新游戏。“你列出一串名字，”他给纽约的朋友写信说，“这些人得彼此相关，即后面的人与他（或她）之前那位关系暧昧，然后不断加长，看上去越离谱越好。”被这种关系穿起来的人没完没了，但他最喜欢、最离谱的那串名单是把凯博·卡洛威与阿道夫·希特勒连接了起来。根据卡波蒂的算法，在全美国大受欢迎的爵士音乐家与头号恶魔之间，只隔了三个人。

不管是对女人还是对男人，卡波蒂都常常用一些颇具创意的昵称，既有“宝贝”、“亲爱的”和“心爱的”，也有“小心肝”、“亲亲小羊”、“我美丽的玉兰”和“称心梅”。不知情的人会以为他与书中大多数人都有过风流韵事。而实情虽然不那么耸人听闻，却也非常有趣。他就像一个渴望宠爱的孩子，毫无保留地爱着他的朋友——他也一遍一遍地这样告诉他们——并希望他们给予同等的回报。在他与安德鲁·林登之间，性的关系绝无可能，但他在写给林登的信中说：“今天我觉得对你充满了爱，一醒来就想起你，并希望今天不是星期天，那么起码还可望有封信。”谁能

拒绝如此热情的表白呢？

对于敌人，卡波蒂的口舌就像刺客的匕首一般犀利尖刻，毫不留情。但是他不给自己的敌人写信。他只写给朋友，他对他们始终慷慨大度，几乎像一个圣人。当他们取得即使是一点点成就时，他总是不吝溢美之词；一旦他们遇到挫折，他总是给予安慰，并提供帮助和钱财，哪怕他自己手头拮据。不过，如果有人背叛了他，他也就绝不饶恕。比如五十年代初，他曾全力帮助过一位住在纽约的得克萨斯作家威廉·戈因，二十五年后，当戈因的妻子请他为她丈夫的第一部小说出版二十五周年的纪念版写一篇好评时，卡波蒂就建议她去看看戈因对《蒂凡尼的早餐》一书所作的轻视乃至鄙薄的评论，以便明白她的请求“是多么可笑”。“在你朋友创作生涯的初期，我对他一直友好帮助——他的回报却是彻底的背叛（就像对凯瑟琳·安·波特和他以前的情人斯蒂芬·斯宾德一样）。”

对朋友热情，喜欢八卦，性格开朗——这都是卡波蒂的特点。几乎直到最后，他还是一位志向远大严谨敬业的作家。“如今，成为艺术家完全是出于一种信念，”他告诉一位朋友，“你从中所能得到的唯有艺术本身所带来的满足感。”写这些话时，他年仅二十五岁，在那时，他就立志要加入福楼拜、普鲁斯特、詹姆斯和福克纳等作家的神圣行列。在交付他的第一部小说《别的声音，别的房间》之前，他在写给兰登书屋编辑罗伯特·林斯科特的信中说：“这最后几页啊，字字都呕心沥血！”而对一位敏感的年轻作家来说，林斯科特则是一位理想的编辑，总是热情鼓励，但觉得必要时也会提出批评。卡波蒂在自己的第二部小说《草竖琴》开头几章得到赞扬时，给林斯科特写信说：“太棒了太棒了太

棒了！”而当林斯科特对小说的结尾表示失望时，卡波蒂又深感沮丧。“我无法忍受，你们都认为我的书写砸了，”他说。

事实上，卡波蒂是他自己最好的评论家，对自己的作品与对别人的作品一样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在致《纽约客》编辑威廉·肖恩的信中，他说自己写完了一篇作品《俄国革命的女儿》，但完成之后才意识到“它没有很好地跟上节奏”，必须重新修改。后来他将其彻底放弃。“我好像对那篇作品失去了信心，或者起码是觉得我没有能力为之，”他告诉肖恩。对所有的作家——不管是新手还是经验丰富者——来说，他的书信肯定具有教育意义和鼓励作用。但是我想，即使不是作家，从中也同样能够受益匪浅。

“好的书信不在于传达信息或者令收信人开心，”里顿·斯特拉奇写道，“偶尔也可能达到这两种效果，但其根本目的在于表达作者的个性。”本书收录的书信证明了斯特拉奇这一论断的正确性。它们传达了信息——大量的信息——并且往往还旨在令人开心。但尤为重要的是，它们表达了一种十分开朗豁达、对为人要严肃这一公认法则不以为然的个性，这是其他任何方式所无法表达的东西。

杰拉尔德·克拉克

2004年4月1日

纽约州布里奇汉普顿

这些书信出自杜鲁门·卡波蒂——而不是我——之手，我只是做了些小改动，让它们变得清楚易读。卡波蒂的书信大多是手写而成，但在那十来封用打字机打出的信中，他效仿了许多打字者的坏习惯：无视大写键，一律用小写体打出所有内容（包括人名地名）。由于没有大写字母的信件读起来很别扭，我便不声不响地加上了必要的大写。在包括手写体书信在内的所有信件中，他还很少在意撇号——似乎对它们很反感。他往往把缩略形式的 it's 处理成 its，^①就像所有格代词一样。他还几乎从不在意表达所有关系的所有格符号，如 Jack's book 可能会写成 Jacks book。如果我将这些疏漏之处一一标出，他的信中就会堆满“[原文如此]”的标记。为避免如此，我在该有的地方都加进了撇号。

我还纠正了明显因为匆忙而致的错误，将其视为打字错误来看待。比如，有好几个地方，卡波蒂显然是要用一个词，却写成了两个，如 the the 或 be be。我便删去了其中一个。又比如他漏掉了 Phoebe 中的 o，这是他的一位挚友的名字，而在其他许多地方他都拼写正确。在这种情况下，我加上了那个明显的字母 o。

不过，我绝对无意对这些信件进行清错净化，当卡波蒂出的错误确属错误时，我就保留原样，随后再加上一个必不可少的“[原文如此]”。多数时候，卡波蒂的拼写都很正确，但有些单词——如 receive, genius 和 disappoint——他总是无法写对，我就保留了其拼写错误——recieve, genuis 和 dissappoint。他也记不清

Tennessee (田纳西)中到底有多少个 n 和 s——而田纳西·威廉斯这个名字又经常出现。我保留了他的错误拼写, 但将正确拼写放在随后的方括号里, 他拼错的其他名字我也同样处理。偶尔几处语法错误, 如 she has not written either Jack or I, 已忽略未计。我觉得过多的“[原文如此]”令人反感。

除了提到的这些细小之处外, 我将卡波蒂的书信几乎原封未动地呈现出来。我既没有改动也没有删减——我认为一封信应该要么全文收录, 要么干脆不用——偶尔的省略或圆括号是他自己而不是我所为。除了脚注, 我所做的编辑处理全都置于方括号内。尽管我可以小小地自夸一下, 说我是辨认卡波蒂手迹的行家, 但仍有几处地方, 他的笔迹令我困惑, 或者个别词因为影印不清而难以辨识。我没有去擅自揣摩他的意思, 而是用方括号标出“[此处不清]”的字样。他常常因疏忽而忘了写日期。当信封上的邮戳也找不到时, 我就尽可能地根据信内的证据来判断写信的时间。

在每一封信的最后, 我标明了该信原件的保存之处, 有时是人, 有时是图书馆。但是有好几封收录的信件, 我却不知道它们的来源。有的是我十多年前为撰写卡波蒂传记收集材料时碰到的。自那以后的这些年里, 给我复印件的人可能已经去世, 或转交他人保存。类似这种情形, 我只好标明“[佚名收藏]”。我还得到过几封后来被拍卖的信件的复印件, 如果不知道那些信由谁买下, 我同样标明“[佚名收藏]”。

① 译者注: 编者提及的卡波蒂书信中的拼写问题在译文中未能呈现。本书其他注释均为编者注。

目 录

引言 001

编者的话 001

1924—1948

豪迈年代：亚拉巴马的巫师和纽约的精灵 001

1949—1959

冒险年代：外出闯荡 073

1959—1966

一家四口被杀与黑白化装舞会 345

1966—19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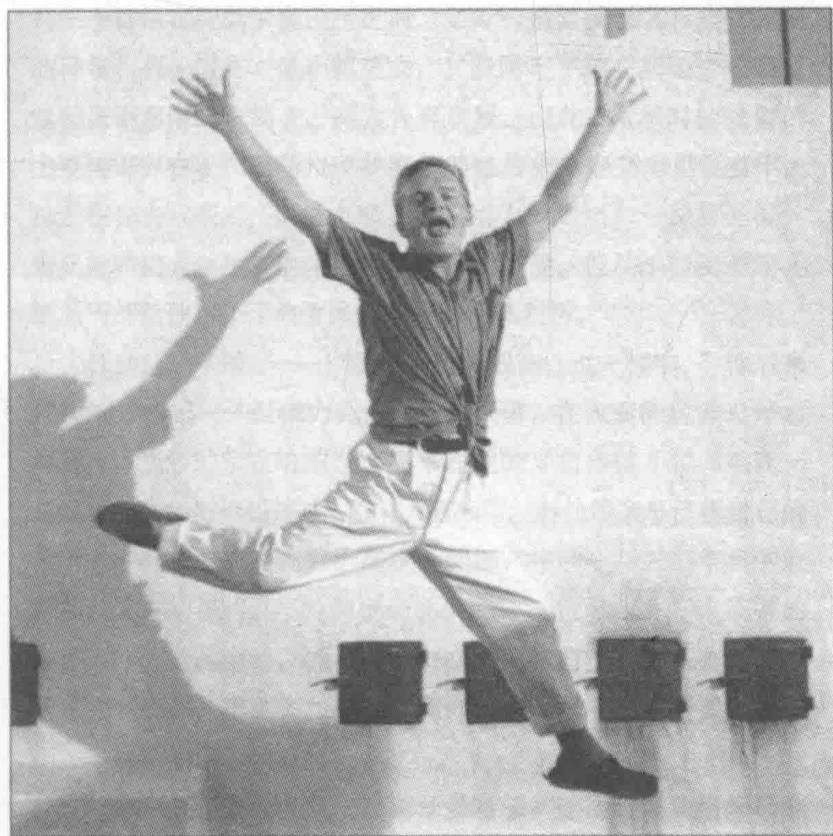
应许和未应许的祈祷 543

卡波蒂年表 587

致谢 592

1924—1948

豪迈年代：
亚拉巴马的巫师和纽约的精灵



杜鲁门·卡波蒂的人生从一开始就乌云笼罩。一九二四年九月三十日他在新奥尔良出生之时，父母的婚姻就已名存实亡。他的母亲莉莉·梅是一位小镇美女，父亲阿奇·珀森斯是个仪表堂堂却毫不靠谱的策划人，两人各奔东西。因此，童年时的杜鲁门主要被寄养在亚拉巴马州蒙罗维尔的几位中年表亲家里，当年他母亲在失去双亲后，也是由那三位当用人的表姐和一位打光棍的表兄抚养成人。尽管他生活中从未缺少关爱，但从小被父母遗弃的经历却给他留下了终生未能愈合的情感创伤。

杜鲁门个子矮小——“我跟猎枪一般高，也一样响，”他后来这样描述自己——但精力充沛，鬼点子多，在人多的地方总是出尽风头。当年的挚友哈珀·李后来在她的半自传体小说《杀死一只知更鸟》中把他描述成一位“小巫师”。而他母亲早已将自己的乡下名字莉莉·梅改成更为高雅的妮娜，并于一九三二年将卡波蒂接到北方的纽约，与她和她的丈夫——一位名叫乔·卡波蒂的古巴人——一起生活。乔·卡波蒂在华尔街有一份好工作，对孩子也宠爱有加，并在一九三五年正式收养了杜鲁门，于是，杜鲁门·珀森斯变成了杜鲁门·卡波蒂。

一九三九年，卡波蒂一家离开曼哈顿，迁往康涅狄格州格林尼治的高档住宅区。他们居住的地方是成片的都铎式房屋，街道两旁绿树成荫。当卡波蒂还住在亚拉巴马时，就说过自己的理想

是成为作家。到了格林尼治高中，他遇到了每一位胸怀大志的作家都需要的贵人——一位富有同情心并且不断鼓励他的老师，她名叫凯瑟琳·伍德。在格林尼治，杜鲁门还找到了一位心灵伴侣菲比·皮尔斯，那是一个漂亮而优雅的姑娘，也立志要成为一名诗人。尽管他写给她的信只有一封——他亲昵地称她为“菲比小鬼”——她的名字却在他与其他人的通信中经常出现。

离开三年之后，卡波蒂一家重新回到纽约，住进公园大道1060号公寓。在迟迟才从曼哈顿西区一所私立高中毕业后，卡波蒂在《纽约客》找到一份工作——但只是一位送稿工。那家杂志认为卡波蒂的小说过于标新立异，不符合其正统严肃的斯卡斯代尔小镇品味。当时的女性时尚杂志经常发表美国最具创新的小说，于是，《纽约客》所不屑一顾的天才很快获得两位独具慧眼的小说编辑的青睐，他们是《时尚芭莎》杂志的玛丽·露易丝·阿斯维尔和《小姐》杂志的乔治·戴维斯。两人争相发表卡波蒂的作品，在二战结束后的几个月里，刚刚二十出头的卡波蒂就成了文学市场上炙手可热的人物。

不过，家里的事情却并非事事顺利。妮娜·卡波蒂酗酒上瘾，经常大发雷霆，不是控诉乔的不忠，就是斥责杜鲁门的同性恋。杜鲁门觉得住在公园大道越来越难以从事创作，便于一九四六年暂避于雅都——位于纽约州北部世外桃源般的文艺人士社区。当年夏天同在雅都的一位作家把他比作莎士比亚笔下匡扶正义的精灵，但他还是一个喜欢冒险和恶作剧的精灵。雅都以风流韵事而闻名，卡波蒂也陷入两段恋情，其一是与一位英俊、已婚的历史学家霍华德·多迪，其二是与多迪的好友之一、有时也是其情侣的牛顿·阿文。对杜鲁门而言，与多迪的关系只是一时心血来潮，但两人后来一直是朋友。而对身为马萨诸塞州北安普敦

史密斯女子学院文学教授的阿文，他却产生了真爱。

他们之间并不般配。二十二岁的卡波蒂看上去似乎还不到二十，而四十六岁的阿文则像是年过半百，他头顶已秃，戴着眼镜，一副胆小怕事的样子。两人的个性也大相径庭。卡波蒂几乎总是热情洋溢，阿文则腼腆内向，只要离开北安普敦的小天地就很不自在。但阿文的文笔豪放，而且与许多文学教授不一样的是，他本身还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一针见血的评论家和饱学之士。在两人保持关系的两年里——卡波蒂每逢周末就去北安普敦——阿文给他的年轻伴侣提供了他从未接受过的大学教育。卡波蒂常说，阿文就是他的哈佛。

周一到周五的日子，卡波蒂享受着纽约的生活，结交的朋友圈也逐月增多。有一个圈子的中心人物是里奥·勒曼，他性情随和，是文学圈的牛虻，其每周日晚举办的派对成了曼哈顿的一个惯例，吸引着几乎所有的名人，包括作家、编辑、影星和剧作家。另外两个圈子的中心人物分别是他的两位杂志社编辑：《时尚芭莎》那位颇受拥戴的玛丽·露易丝·阿斯维尔和《小姐》杂志那位稍显刻薄的乔治·戴维斯，后者的警言妙语堪与奥斯卡·王尔德媲美。卡波蒂在自己的第一部小说《别的声音，别的房间》出版后，曾经征求戴维斯的意见。“哦，”戴维斯说，“我想总得有人去写童话版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卡波蒂的新出版商是兰登书屋的本内特·瑟夫，当时与妻子菲莉丝住在东区的一栋豪宅里。卡波蒂踏进他们的家门之后，发现了一个更加显赫的名流阶层。在这里，他讲述各种故事，传达各种八卦，也成为圈子的中心人物。战后的那几年，比较活跃的人物——也是卡波蒂经常通信的对象——还包括两位来自佐治亚州的胸怀抱负的作家唐纳德·温德姆和安德鲁·林登，以及诗

人、大学教师、后来还成为第 92 街曼哈顿青年友谊会诗歌中心负责人的约翰·马尔科姆·布里宁。

《别的声音，别的房间》于一九四八年冬出版之后，卡波蒂顿时名扬全国——当时的美国人比现在更看重文学。几个月后，他前往欧洲，不出所料地见到了英国和法国的一些大文豪。回国之后，他发现阿文及其隐士般与世隔绝的方式已经不适合自己。而在卡波蒂离开期间，阿文已经与安德鲁·林登发展出秘密恋情，因此对卡波蒂这位喜欢热闹、常常让他疲惫不堪的伴侣，他也正乐得放手。尽管两人诚挚的友情一直维持到一九六三年阿文去世，但卡波蒂已经开始寻找新的伴侣。

一九四八年十月，他找到了意中人。杰克·邓菲比卡波蒂年长十岁，身材健美——他曾在原创音乐剧《俄克拉何马！》中担任过舞蹈演员——英俊中又有几分傲慢。他心直口快，不管是对卡波蒂还是对其他人。邓菲同样是一位作家——而且很优秀，已出版一部小说，另一部在创作之中，后来还推出几个剧本。这一次的爱情很持久，邓菲成了卡波蒂余生的忠实伴侣。